

晚明赴京使臣與朝鮮西學之發展

譚樹林*

赴京使臣是指朝鮮王朝每年向明清政府派遣出使到北京（燕京）的外交使節。他們通過與在北京的西方傳教士交往，將西洋文物輸入朝鮮，不僅最終導致“朝鮮西學”思潮的出現，而且也成為催生朝鮮實學的重要因素。鄭門源一行是最早與西洋傳教士發生交往、並將西洋文物輸入朝鮮的赴京使臣。本文在着重考察鄭門源此行輸入的西洋文物及其對朝鮮西學發展影響的同時，亦對二者在登州晤面的原因進行了探究。

赴京使臣亦稱“赴京使行”或赴燕使臣，是指朝鮮王朝建立後，作為一種事大外交關係，每年向明清政府派遣出使到北京（燕京）的外交使節。朝鮮西學是指17-18世紀經由中國輸入的、由天主教耶穌會士移植到中國的西方文化。它既涵括精神文化方面的天主教信仰，也包括物質文化方面的天文、曆算、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朝鮮赴京使臣通過與西方傳教士交往，將西洋文物輸入朝鮮，這不僅最終導致“朝鮮西學”思潮的出現，也成為催生朝鮮實學的重要因素。據載，鄭門源一行是最早與西洋傳教士發生交往並將西洋文物輸入朝鮮的赴京使臣。然而，與其他赴京使臣是在北京與西洋傳教士發生交往不同，鄭門源與葡籍耶穌會士陸若漢交往則是在山東登州。因此，本文在着重考察鄭門源此行輸入的西洋文物及其對朝鮮西學發展影響的同時，亦對二者在登州晤面的原因進行了探究。

15-17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揭開了東西方文化交流與貿易發展的嶄新一頁。16世紀以降，伴隨着葡萄牙殖民者東來的足跡，以耶穌會士為主體的西方傳教士開始進入中國傳教。在意識到悠久的中華文明乃有別於產生於歐洲的另一種燦爛的文明後，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認為使中國人皈依天主教信仰的“最善之法莫若以學術收攬人心，人心既附，信仰必定隨之”⁽¹⁾，於是改變了過去那種“一手拿着聖經，一手拿着皇帝所給的寶劍”的傳教方法，採

取學術傳教和科學傳教，希冀通過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知識，達到使中國人皈依天主教信仰的目的。因而自利瑪竇始，來華耶穌會士陸續用漢文翻譯、編寫了大量天主教及西方科學書籍，將西洋科技移植到中國，形成所謂的“清歐文明”⁽²⁾。當時的朝鮮統治者，“從對科學技術方面的‘器’的重視出發，又從對宗教倫理方面的‘理’的重視出發，將它們引入韓半島”⁽³⁾。由此導致朝鮮形成一股“西學熱”。朝鮮西學輸入者為赴京使臣，他們在逗留中國期間，藉與西方傳教士交往，把一些漢譯西學書及西洋文物帶回朝鮮。據載，最早與西方傳教士交往並將西洋文物輸入朝鮮的是仁祖九年（1631）的陳奏使鄭門源一行。然而，與大多數赴京使臣是在北京與西方傳教士交往，接觸西洋文物並將其引入朝鮮不同，鄭門源與西方傳教士交往卻發生在山東登州。個中緣由及此行對朝鮮西學發展之影響，本文將加以探究。

晚明遼東局勢與朝鮮使臣赴京貢道的改變

明朝建立後，與朝鮮建立了密切的朝貢關係。朝鮮對明朝採取“以小事大”、“事大以勤”⁽⁴⁾的外交策略，“每歲凡萬壽聖節、正旦、皇太子千秋節，皆遣使奉表朝貢，貢方物。其他慶慰、謝恩等使，率無常期，或前者未還而後者已至”，以至“貢

*譚樹林，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獻歲輒四、五次焉”。⁽⁵⁾明朝亦頻繁遣使朝鮮，終明一朝，共遣使朝鮮一百八十六次，大大超出明朝遣使其它國家的次數。⁽⁶⁾明朝與朝鮮的通道，本有海道與陸道兩路，但“二者的或廢或興，與明朝在遼東的經營及後金勢力的興起有密切關係”⁽⁷⁾。明初定都應天（今南京），由於遼東地區仍為元朝殘餘勢力控制，加之明太祖朱元璋生性多疑，擔心高麗、朝鮮使臣借機窺探明朝國內虛實，乃規定朝鮮使臣走海路赴京，即先乘船抵山東半島，然後沿山東半島南行，經黃海、東海入長江口由太倉直接到達應天。但是，由於海路朝貢風險遠甚於陸道，如1370年高麗貢使洪師範、鄭夢周等一百五十餘人走海路朝貢，結果發生海難，“失風溺死者三十九人，師範與焉”。⁽⁸⁾因此，朝鮮方面從安全、便捷出發，提出取遼東陸道使華的請求，但未得明廷批准，仍規定“朝貢道路，三年一貢，從海送來”。1387年後，明朝最終消滅了盤踞在遼東的元朝殘餘勢力，控制了遼東半島，開通了自山海關至遼東的驛道，明朝方准許朝鮮貢使先走陸路至遼東，然後渡海至山東登州，在清淮驛乘船沿運河南下進京。1389年朝鮮貢使權近赴明，所行路線已為“逾鴨綠，渡遼河以北抵於燕，浮河而南入淮泗，歷徐、兗之墟，溯江漢以達於京師，由淮而北過齊魯之東，以涉渤海，往還萬餘里”⁽⁹⁾。對這條貢道，李朝定宗二年（1400）十一月至翌年三月出使明朝的李詹在其《觀光錄》中則有更詳細的記載：

西元1400年（明建文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晚，渡鴨綠江，入明境。十二月四日至松站（……）十五日至鞍山驛，十七日至海州。此後經熊嶽站、五十寨、古字蘭站、甲匠舖、木場舖。二十六日，自旅順口乘船渡海。二十七日，至（山東）登州海口。翌日登岸。二十九日過黃縣。而後經密州、日照、清淮驛。在清淮驛乘船沿運河南下，經界首、高郵、揚州、龍江，最終至明都金陵（南京）。⁽¹⁰⁾

明成祖遷都北京後，朝鮮使臣取道從義州經遼陽、廣寧，入山海關達京師的陸路。這條陸路使朝鮮使臣赴京的路程和時間大大縮短，由陸路入京遂

成定制。然而，萬曆以後，隨着女真族勢力興起，明與朝鮮的陸上交通愈來愈不安全，雙方往來使者經常遭到後金的阻撓、攔截。早在1480年，朝鮮就曾因“每遣使來，被女真建州夷人邀劫於路，請改貢道自遼陽之南，徑趨廣寧、前屯衛入山海關”⁽¹¹⁾，但職方郎中劉大夏認為：“朝鮮貢道自鴉鵲關趨遼陽，過廣寧又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鎮戎。此祖宗微意。今若渡鴨綠江越遼陽，徑趨前屯以入關，則路太徑，恐貽他日之憂。”⁽¹²⁾有鑒於此，明廷沒有同意朝鮮的請求。

但是，隨着遼陽到山海關的驛站也受到後金威脅，陸上貢道的安全更加危險。1589年出使明朝的朝鮮使臣蘇光震在描述這段貢道時這樣寫道：“與虜接境，遠者或八九十里，或三四十里，近者或十五六里。廣寧以東如沙嶺、高平、盤山，廣嶺以西自小凌河至中前所等處，俱極可虞，而沙河、前屯衛之間，有所謂葉家墳、狗兒舖處最難。”他並認為“大概此路北連虜塞，南臨大海，祇是一條線通遼薊全脈，甚是危途，我國似不當全忘海路也”⁽¹³⁾，較早提出了應當重視海路的建議。1616年，女真族首領努爾哈赤即位稱汗，國號“金”，史稱“後金”。1618年6月，努爾哈赤以“告天七大恨”誓師征明，兩次在薩爾滸（今撫順）大敗明朝和朝鮮的聯軍，遼東局勢的這種驟變使陸上貢道面臨斷絕的危機。1619年10月，遼東巡撫周永春上奏請援：“鎮江（今丹東）為朝鮮入貢必由之路，又登萊之咽喉而金複四衛之門戶也，鎮江一失，朝鮮必亡，海道必絕，乞敕下兵部議添兵將以固東藩。”⁽¹⁴⁾為了確保貢道暢通，遼東經略熊廷弼曾派二萬九千名士兵到鎮江作戰，但由於聲援不及時而遭失敗。1620年，後金軍攻佔明遼東重鎮、遼東都司所在地遼陽，明與朝鮮的陸上貢道被斷絕。天啟元年（1621）二月，頒詔使劉鴻訓、楊道寅出使朝鮮時走的還是遼東陸路，但返國時因遼陽陷落，祇得改走海道。朝鮮備邊司啟奏光海君，派使臣隨明使赴京：“二百年來，使臣浮海朝天，創自今日，今此陳慰使臣若不隨行天使以行，則決無得達之路。而詔使已發，拜表之日尚未擇定，以事體言之，則我國使臣先行船所，當待天使之行可也。若失其機，朝京之路絕矣。所繫非輕。”⁽¹⁵⁾朝鮮於是派使臣與劉鴻訓同行。當他們

行至旅順口時，夜半突遇狂風，九艘船全部沉沒，大部分隨行人員淹死，劉鴻訓倖免於一死，“跳淺沙，入小舟，漂泊三日夜，僅得達登州報命”⁽¹⁶⁾。此時已到六月，登州海道由此開通。天啟元年（1621）八月，明政府正式下令朝鮮赴燕使臣“自海至登州”⁽¹⁷⁾，然後再由陸路進京。據天啟四年（1625）以聖節兼冬至使身份入京朝貢的洪冀漢《花浦先生朝天航海錄》記載，這條貢道大致為：自朝鮮宣川府宣沙鋪發船下海，達到鐵山嶺島，再到車牛島、竹島（……）過鹿島、石城島，入長山島，向廣鹿島，再到三山島、平島、砣磯島、泊廟島到登州，以後即為陸路：由登州至黃縣，再經萊州掖縣、昌邑、維縣、昌樂、青州、長山、鄒平、章丘、濟南、濟河、禹城、平原、德州、景州、阜城、獻縣、河間、任邱、雄縣、新城、涿州、良鄉等府縣，抵達北京，經朝陽門入京。⁽¹⁸⁾這條貢道水陸兼程，與此前的陸路相比，不僅路程距離遠了很多，而且風險亦加大許多。儘管如此，此後直至崇禎二年，朝鮮赴京使臣均取此道進京。

然而，到崇禎二年（1629），負責寧遠事務的經略袁崇煥提議將朝鮮貢道改為從朝鮮宣川出發，沿遼東半島西行，然後再從遼東半島往北，縱斷渤海，經覺華島上寧遠，從寧遠經陸路由山海關抵京，明朝政府從之。但是，改道後的路途更加險惡。對此，鄭經世在〈請覆登州舊路奏文〉中有如下描述：

崇禎三年四月初四日，據進賀兼謝恩陪臣李忭在山海關馳啟，臣等一行，乘船五十日，始到覺華島，得達寧遠，海程之險，有難盡陳。自平島至登州，風便一日程，而至覺華島，則殆將倍之。所謂雙島者，南北汎口，相去色絕，中間又無島嶼，依泊之處，目見冬至使尹安國，到此洽沒。⁽¹⁹⁾

朝鮮《（增補）文獻備考》亦曰：“改陸後，覺華島水路遠倍登州。所經鐵山嘴一帶巨海接天，絕無島嶼，躲藏暗礁，險惡無比。數年之間陪臣淹死者五人，中朝符驗表咨及方物並皆漂失。”⁽²⁰⁾正因如此，朝鮮赴京使臣自始即不願從覺華島登陸赴京，屢次派使臣奏請恢復登州航路，李朝國王李瑄亦請求“改朝鮮貢道，自海至登州，直抵京師”⁽²¹⁾。

但是，明廷仍未予允准。1627年，後金統帥阿敏率軍侵入朝鮮，史稱“丁卯之役”。在後金軍的強大壓力下，李朝被迫與後金議和，三月三日，朝鮮國王仁祖與後金南木太等在江華島盟誓，兩國結成“兄弟之盟”。事實上，李朝在後金軍事壓力下，雖與後金結成“兄弟之盟”，但仍視明朝為天朝上國，堅持對明事大政策。為此，仁祖大王於1630年派鄭門源為陳奏使出使明朝，除向明朝表白仍持對明事大的外交政策外，另一重要的目的即要求明廷“請復登州舊路”⁽²²⁾。

徐光啟購砲募兵計劃與陸若漢被派赴登州

1619年3月，明援軍在薩爾滸（今撫順）被後金軍大敗，引起明廷震動。徐光啟於六月上疏朝廷，指出明朝“兵政之馳，兵勢之弱，未有如今者”，欲克敵制勝，“惟盡用西術，乃能勝之。欲盡其術，必造我器盡如彼器，精我法盡如彼法，練我人盡如彼人而後可”⁽²³⁾。萬曆四十八年（1620）四月，徐光啟臨危受命訓練新兵、防禦京城後，即致函在杭州家居的奉教友人李之藻和楊廷筠，設法購求西銃、招募葡兵以備練兵。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在給羅馬教廷的報告中指出：“光啟所貢獻之方法之一，即為招募葡萄牙兵。”⁽²⁴⁾在徐光啟的動議下，李之藻和楊廷筠決定以私人捐資方式，派遣李之藻門人張燾和孫學詩赴澳門購砲。張燾精於西洋火器，嘗著有《西洋火攻圖說》一卷。泰昌元年（1620）十月，張燾在購得四門大砲後自澳歸，澳門方面選派葡籍砲師四人和兼伴通事六人，護送至廣州。由於徐光啟在天啟元年（1621）二月因病乞歸，李之藻等人擔心“銃到之日，或以付之不可知之人，不能珍重，萬一反為夷虜所得，攻城破陣，將何抵當”，祇得命令張燾將四門大砲暫置於江西廣信府（今江西上饒），砲師則被遣送回澳。天啟元年（1621）三月，瀋陽、遼陽相繼失守，明軍原來擁有的火器亦盡落敵手。為此，購買西銃之議重起。四月，徐光啟給朝廷的奏疏中即稱：

今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大砲。蓋火攻之法無他，以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捍

衛勝無捍衛而已。連次喪失中外大小火銃，悉為奴有，我之長技，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矣。今欲以大、以精勝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年所取西洋大砲。欲以多勝之，莫如即令之藻與工部主事沈槩等鳩集工匠，多備材料，星速鼓鑄。(25)

徐光啟力主購買西銃，並建議由李之藻和沈槩大量製造西洋大砲。天啟元年(1621)四月，李之藻改任光祿寺少卿兼工部郎中，奉旨調京以加強京城防禦。李之藻上〈為制勝務須西銃乞敕速取疏〉，建議應速派人將置於廣信的四門大砲運來京師，聘請熟悉火器技術的陽瑪諾(Emmanuel Diaz Junior)和畢方濟(François Smbiasi)等耶穌會士進京，協助建臺鑄砲。兵部尚書崔景榮亦在五月奏請，派孫學詩前往廣信，將置留在那裡的四門大砲在一月內運抵京師。但由於各種原因，四門砲中有兩門先被運抵京師，另兩門遲至天啟元年(1621)十二月才運抵。由於軍情緊急，孫學詩抵京後，旋又和張燾被明廷正式派為欽差，持兵部檄文再往澳門購砲，並選募葡籍砲師來京。澳葡當局為取悅中國皇帝，亦積極協助。張燾、孫學詩此次共購大砲二十六門，天啟三年(1623)四月運抵京師，並募得葡籍砲師等二十四人隨同抵京。對此，《明實錄》載道：“兵部尚書董漢賓等言，今其來者夷目七人，通事一人，兼伴十六人。”這裡的“通事”就是葡萄牙籍耶穌會士陸若漢(João Rodrigues Tçuzzu, 1561-1634)。陸若漢本為派往日本的傳教士，1577年到達日本。因他“諳練語言”(26)，很快掌握日本語，在教務之餘，被聘在德川幕府中擔任通譯，協助處理海外關係。耶穌會也得其協助，從長崎和澳門間的海上貿易中獲取鉅額利潤。1612年，陸若漢因得罪異教人士以及幕府權貴而被驅逐出日本，來到中國澳門。隨後德川幕府在1614年頒佈嚴禁基督教、驅逐所有傳教士的命令，包括日本修士在內的大批耶穌會士不得不離開日本，前往澳門或馬尼拉避難。此時已避居澳門的陸若漢便再無機會返回日本，從此活躍在澳門、廣州及中國內地，直至1634年病逝。陸若漢極富語言天才，在澳門的幾年間就已熟稔中文，1621年澳門葡人進京已被聘為通事。

對於徐光啟等提出的購砲募兵請求，澳葡當局從改善與明朝政府的關係出發，慨然應允，而陸若漢因熟諳中文，又精通西洋火器的製造及操作，加之其有與中國官方長年打交道的經驗，遂被選為“通事”，從此以後陸若漢參與了晚明朝廷幾次赴澳購砲募兵計劃。

這樣，在1620-1623年間，明廷從澳門購進的西洋大砲已達三十門，這與兵部主事孫元化所言“澳商聞徐光啟練兵，先進四門，迨李之藻督造，又進二十六門”(27)亦相吻合。

二十六門大砲及隨行的葡籍砲師抵京後，兵部尚書董漢儒奏請由葡籍砲師教練京營士兵學習製砲及試射，得明廷允准。但不久有一門砲發生膛炸傷人事件，葡籍砲師若翰哥里亞被炸死，“上聞悼惜，賜葬於西便門青龍橋”(28)。此事發生後，有明官員“遂斷其必有害而無利，立命返澳，毫無挽回餘地”(29)，將葡人全部遣返回澳。御史彭鵬化提出將一部分西洋大砲運往山海關及寧遠抗金前線，這樣，剩餘的二十九門火砲中有十八門留守京城，另外十一門後來被調往關外的寧遠城，在天啟六年(1626)袁崇煥指揮的寧遠保衛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明軍憑藉佈置在城頭的十一門西洋製大砲，“迴圈飛擊，殺其貴人，每發糜爛數重”，“是役也，奴賊糜爛死亡者實計一萬七千餘人”(30)。努爾哈赤本人也在此役中受傷，並於該年八月含恨以終。袁崇煥在總結此役成功經驗時認為：“虜利野戰，惟有憑堅城以用大砲一着。”(31)在戰鬥中功勞最大、被朝廷冊封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的那門砲，就是徐光啟等人首次購買的四門砲之一。寧遠保衛戰使西洋火砲威力盡展，使明廷更加重視購買、鑄造西洋大砲及招募葡籍砲師。

崇禎二年(1629)年，朝廷採納徐光啟購砲募兵建議，命兩廣總督王尊德赴澳招募砲手，購置大砲。澳門葡商捐獻西洋大砲十門及火繩槍若干支，派葡將公沙的西勞為統領，耶穌會勸善掌教陸若漢為通譯，率三十一名葡籍砲手，三月自廣州出發北上，十一月到達涿州，恰逢後金軍攻掠京畿，無法進京，他們便協助防守涿州，後金軍因懼西洋大砲“環視涿州而不攻”退走。崇禎二年(1630)正月初，陸若漢等奉旨留四門大砲加強涿州城防，攜其餘六門大砲入京。崇

禎大喜，當即下令“京營總督李守筠同提攜諸臣，設大砲於都城衝要之所，選將士習西洋大砲點放法，賜名神威大將軍”⁽³²⁾。陸若漢、公沙的西勞等留京，為明廷製造、教演大砲。陸若漢等很快就為明廷訓練了二百多名砲手，但製造西洋火器卻因費用較大、技術一時也難以精湛而進展緩慢。在這種情況下，陸若漢、公沙的西勞二人向崇禎帝上疏，欲親自帶人去澳門購砲募兵。徐光啟亦上疏，請派人前往澳門招募砲手二百、隨從二百，自帶兵器，以作先鋒。若能得此協助，再加上廣東將要運至的一批西銃，“不過數月可以廓清畿甸；不過二年可以恢復全遼”⁽³³⁾。在徐光啟等的全力保舉下，業已洞悉西洋火器威力的崇禎帝慨然准奏，1630年6月，派中書姜雲龍偕陸若漢赴澳。陸若漢一行抵澳後，澳葡當局認為這是保持“澳門以往所得之特典”之“千載難逢之機，亟願立功報效”⁽³⁴⁾，短短幾天就招募了一百五十名葡人，還有約二百名隨從。經過數月準備後，陸若漢等攜帶四十門大砲動身北上。但由於禮部給事中盧兆龍等保守人士的反對，陸若漢一行到達南昌時，招募葡兵又一次被明廷下令遣返澳門，僅許陸若漢等人護送軍械北上。所以，陸若漢此行祇是購買到一些西洋火器，招募葡兵抗擊後金的計劃卻成為泡影。

1631年3月，陸若漢進京覆命，徐光啟鑒於京中形勢和加強登州前線海防的需要，將陸若漢派赴登州，協助孫元化造砲練兵。孫元化為徐光啟門生，時任登萊巡撫。登萊巡撫本已裁撤，但由於東北疆域不斷被後金侵掠，出於加強海防需要，特別是1630年皮島副將劉興治為亂後，明廷復設登萊巡撫，管轄範圍及至旅順、東江等地，成為與後金作戰的重要海防前哨。徐光啟推薦孫元化為新設的登萊巡撫，蓋因其熟諳西洋火器，可以實現其建立“車營”的計劃。“車營”是徐光啟在1630年2月率軍擊退圍困京師的後金軍隊後提出的一個守城、製器和練兵的新計劃。為實現其“車營”練兵計劃，1630年公沙的西勞即被徐光啟派往登州。在陸若漢抵登州後，1631年6月，又有五十三位葡籍砲師及工匠，護送一批西洋火砲自廣州來到登州。另外，通曉西學的王徵、張燾也被徐光啟派到登萊任職。這樣，加上陸若漢、公沙的西勞等葡國砲師及工匠，登州一時成為中國火器鑄造演練的中心。陸若

漢等教練、裝備的孫元化部，也成為當時明軍最精良、戰鬥力最強的部隊。

陸若漢正是在登州協助孫元化造砲練兵時，與朝鮮陳奏使鄭門源相遇。關於兩者相遇的時間，按鄭門源一行是從海路於1630年7月在登州上岸，準備由陸路進京。然而，由於他們未按明朝政府規定的路線來華（明政府規定的出使路線是由海路到覺華島），使團被拒絕進京。鄭門源一行“在登州停留二十餘日”後，經多方斡旋，明政府才允准鄭門源一行入京覲見，並旨令時任登萊巡撫的天主教徒孫元化委差官伴護送使團入京。鄭門源一行於1630年10月抵京覲見明帝后，經原道於1631年6月丙寅返抵朝鮮。⁽³⁵⁾韓國學者李元淳認為正是在登州這段等待時間，鄭門源與被派到登州協助孫元化訓練軍隊、製造西洋火器的陸若漢偶然相遇。⁽³⁶⁾但據前揭可知，1630年10月時陸若漢正在赴澳門購砲募兵途中，1831年3月後才被派赴登州，所以他與朝鮮使臣的會晤，應發生在1631年鄭門源回國途經登州時，方豪神父此說為確。⁽³⁷⁾根據鄭門源一行是在崇禎四年六月返抵朝鮮⁽³⁸⁾，由於從登州到朝鮮航程需一個月，因此二者會晤當發生在崇禎四年六月（1631年7月）之前，具體說應在三月後至五月間，此時陸若漢確已在登州。

鄭門源一行輸入的西學及其影響

鄭門源此行雖然沒有實現請求明廷恢復登州舊路的出使目的，但通過與耶穌會士陸若漢在登州的短促會晤，卻在中朝文化交流史和朝鮮西學發展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陸若漢通過與譯官李榮後的書割往來，向朝鮮使臣介紹了西方天文學、曆算學、地理學乃至天主教方面的知識。李榮後是鄭門源使團譯官，熟稔中文。他在讀過《治曆緣起》、《天文略》漢譯西洋天文書後，寫下〈與西洋國陸掌教若漢書〉信割，向陸若漢提出了許多天文學方面以及中國何以畫在〈萬國圖〉中央等問題：“伏願先生不倦而從頭教之明焉。敝邦之於貴國，天之涯也，地之角也。傾蓋一朝精神交孚，此非千古奇事乎？今不請教，其後也悔。”⁽³⁹⁾陸若漢在收到李榮後的書函後，即寫了〈西洋國陸若漢答李榮後書〉，

對李榮後所詢之事盡其所能給予答覆。因該函係中朝文化交流史上彌足珍貴之文獻，茲錄全文如下：

敝國之人喜遠遊，得至明國，向蒙隆遇，獻以火器，少盡報効之忱。來之東牟，幸逢賢達，聊以所譯書籍奉覽，詎意鑒賞若是耶？〈萬國圖〉以大明為中，便觀覽也。如以地球論之，國國可以為中。中國見此圖，見西人，方知地之大，國之多也。雖東海西海，亦有聖賢，同類、同理、同心，在人之盡心習學耳。伏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經傳，以至釋道之典章，略知其大概。第太極生兩儀，儀分四象，象分八卦，卦生天地人物。以西理推之：太極，氣也，質也，無心無智；若非無窮全能智慧之作者，安能生物乎？若三綱、五常、五倫、治國之道，與敝國同，此世學也。尚有天學，恐秦始皇焚其書，失其傳也。中國惟信古人，或有差訛，亦為遷就。西國之學，自古迄今，時時參討，不得其根源不止也。至若釋老之教，能以實理勅之，立見其誑誕耳，何足好信哉？生人於世，有始必終，始從何來？終從何去？莫大關頭，可不明白？此三教所不論之事，萬祈高明留意焉。天文有盈縮，是以有歲差，漢唐以來，修改者幾？雖元太史郭守敬亦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安得不差？今皇上命敝官輩修曆法，倘得盡譯，可保萬世無差矣。天文細理，不可以片言數位能悉，必俟有暇，細細商論。《治曆緣起》，希簡入，先為熟玩，容圖面晤，不一一。⁽⁴⁰⁾

陸若漢對李榮後所詢給予詳細答覆。尤為引人注意的是，在詳細解釋相關天文地理知識的同時，作為傳教士的陸若漢出於弘教考慮，自然沒有忘記借機宣揚“天學”，即天主教教義。在強調東西方文化“同類、同理、同心”的同時，尤其強調西學優於中學，特別是在天文曆法方面，中國遠落後於西方。陸若漢深知朝鮮受中國文化影響之深，此舉意在使朝鮮學人認識到西學優於中學，以期改變朝鮮儒學者的“中國中心觀”而容受西學在朝鮮的傳播，最終使之成為信奉天主教的國度。

同時，陸若漢藉會晤之機，將許多西洋珍貴文物贈與鄭門源⁽⁴¹⁾，意在向朝鮮使臣展示西方基督教文明。鄭門源一行返國時悉數帶回朝鮮。大體說來，鄭門源一行攜入的西洋文物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為漢譯西學書，即《治曆緣起》、《職方外紀》、《西洋國風俗記》、《西洋國貢獻神威大鏡疏》、《天文略》、利瑪竇《天文書》、《遠鏡書》、《千里鏡說》。《治曆緣起》由徐光啟和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合撰，書中記載了西洋曆法沿革和修改曆法的原委，卷首是《新法算書》和《西洋新法曆書》，接着論述了與《新法算書》有關的十一種曆法書。《職方外紀》是艾儒略（Jules Aleni）與楊廷筠合作，於1623年根據龐迪我（Jacques de Pantoja）和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所譯寫的抄本增補而成，共六卷：一至四卷介紹五大洲各國各地的人文地理，第五卷記載了四海的海洋地理。除澳洲卷外，各卷開頭有各洲的一張地圖。《職方外紀》同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的《坤輿圖說》並稱為漢譯地理書的兩大名著⁽⁴²⁾，傳入朝鮮後，在部分朝鮮學者中廣為流傳，對打破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啟蒙現代世界地理觀做出了極大貢獻。《天文略》為陽馬諾（Emmanuel Diaz）編著《天問略》之誤，該書採取問答的形式對一些天文現象進行解說，其中也加進了有關宗教的意圖，即宣稱第十二重天為不動天，是諸聖人居住的天堂等。此書為加進了宗教目的的天象解說書；也提到了望遠鏡。利瑪竇《天文書》據考為《乾坤體義》，主要講述天體構造及諸星曜與地球體積比較等。

《遠鏡書》即《遠鏡說》，為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編著，1626年出版，是最早向中國介紹西方望遠鏡的專著，論述了望遠鏡的製作及功能，並附有數張圖片，以解釋望遠鏡的功能。《千里鏡說》和《西洋國貢獻神威大鏡疏》是兩本關於西歐光學知識的書，由於兩書已經佚失，具體內容不得而知。

第二類為天文—地理學圖，計有〈天文圖〉、〈天文廣教〉、〈南北極圖〉、〈萬國全圖〉等。〈天文圖〉、〈天文廣教〉為介紹西方天體結構的圖冊；《南北極圖》兩幅即湯若望於崇禎元年（1628）製作的〈赤道南北兩動星圖〉（〈赤道南北總星圖〉），星

名雖按中國傳統的方法命名，但其內容已包含用望遠鏡觀測到的嶄新內容。〈萬國全圖〉指利瑪竇世界地圖。按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在明末先後有不同版本達十二種之多，但流行最廣的是1602年李之藻刊刻的增訂吳中明本的〈坤輿萬國全圖〉。按世界地圖最早傳入朝鮮是在1603年，是年赴京回還使臣李光庭從北京攜回歐羅巴國輿地圖一件六幅。⁽⁴³⁾由於在利瑪竇世界地圖中，據考僅〈坤輿萬國全圖〉為六幅本，故此圖為1602年北京版〈坤輿萬國全圖〉當可確定。至於利瑪竇的〈兩儀玄覽圖〉由何人在何時傳入朝鮮，有論者認為〈兩儀玄覽圖〉是在1604年由赴京使行員帶入朝鮮，⁽⁴⁴⁾楊雨蕾經過縝密考證後認為，〈兩儀玄覽圖〉“最有可能是黃中允〔中允為黃東溟的號——筆者注〕在1620年赴京時將圖帶入朝鮮的”⁽⁴⁵⁾。但是，陸若漢贈給鄭門源的〈萬國全圖〉是否就是1602年李之藻刊刻版，迄今學界尚存爭議。總之，該圖繪出了赤道北地、南地半球，註明地為圓形、南北二極、赤道南北晝夜的長短、五帶；列出了五大洲的名稱，即歐羅巴、利未亞（非洲）、亞細亞、南北亞墨利加（南北美洲）、墨蠟泥加（南極洲與大洋洲），以及歐洲的三十餘個重要國家像拂郎察（法蘭西）、以西把泥亞（西班牙）。它介紹了以水晶球體系為基礎的歐洲天文學知識，包括地圓說、天球基本圈和基本點、各層地球的半徑、日月五星相對於地球的大小、恆星的星等以及日月食原理等。

第三類，西洋器物，包括望遠鏡、日晷、自鳴鐘、火砲、焰硝花、紫木花等。朝鮮《李朝實錄》對這些西洋器物的功用有詳細記載：

辛未（崇禎四年）七月甲申，陳奏使鄭門源回自帝京，獻千里鏡、西砲、自鳴鐘、焰硝花、紫木花等物。千里鏡者能窺測天文，覘敵於百里之外云。西砲者，不用火繩，以石擊之，而火自發。西洋人陸若漢者來中國贈門源者也。自鳴鐘者每十二時其鐘自鳴。焰硝花即煮硝之成土，紫木花即木花之色紫者。⁽⁴⁶⁾

這些西洋器物多為首次傳入朝鮮。鄭門源攜回的西砲因“精巧無比，實合戰用”，尤為朝鮮國王李

倬所重，“上以其志在禦敵，特加一資因臺啟還收”⁽⁴⁷⁾。而製造火器所必須的原料焰硝的傳入，則意義更大，因為它一直是明朝政府的管制品，嚴禁輸出國外，對與明朝關係密切的朝鮮亦不例外。從1592年起，為了抵抗日本入侵，朝鮮才獲允每年派遣冬至使到中國時購買三千斤，但此數僅可供練習之用，遠不敷所需。無奈之下，朝鮮自1620年嘗試自我煮取焰硝，然而由於不得其法，收效甚微，1624年國王李倬不得以下令，以重賞向從遼東逃難而來的中國難民募求精通焰硝製法者。⁽⁴⁸⁾由於對焰硝需求殷切，朝鮮遂利用派員出使中國的機會多方設法獲取。就在1631年，朝鮮譯官韓彥博因在登州偷買焰硝而被都督黃龍告發，明朝政府下令收還當年原由內庫撥給的焰硝，以示對這一違禁行為的嚴懲。⁽⁴⁹⁾在這種情況下，鄭門源從陸若漢處獲贈作為“煮硝之土”的焰硝花，對朝鮮煉取火藥和火器製造便具有了更為重要的意義。儘管到崇禎七年（1634）朝鮮煮得的焰硝亦不過五百餘斤，但對於緩解因明廷禁止朝鮮購買焰硝所引發的火藥欠缺起到一定作用則是毋庸置疑的。西砲、製作火器的焰硝花以及望遠鏡的輸入，對於提高朝鮮軍隊的武器裝備、增強戰鬥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赴京使臣將西學輸入朝鮮始於17世紀初。然而，無論就西學輸入的規模抑或對朝鮮西學發展的影響，此前的赴京使臣均難以與鄭門源一行相媲美。

首先，漢譯西學書特別是各類漢譯天文—地理學圖書的傳入，使朝鮮學人接受了水晶球體系和地圓說等西方天文地理學知識，使他們逐漸擯棄了傳統所持的以中華為中心的世界觀，促成了其向近代世界觀的轉換。⁽⁵⁰⁾隨著利瑪竇世界地圖在1603年傳入朝鮮，上面繪刻的九重天圖、天地儀圖、日食月食圖、南北半球圖等天文地理學圖表已被朝鮮學人目睹，此次〈萬國全圖〉等的再次傳入，使有關水晶球體系和地圓說得到了更為系統的介紹，很快引起了朝鮮學人的注意。同時期的李晬光就提到：“余嘗見歐羅巴人馮寶寶所畫天形圖，曰天有九重，最上為星行天，其次為日行天，最下為月行天，其說似亦有理。”這裡的“馮寶寶”係利瑪竇的“瑪竇”二字之訛。儘管在朝鮮最終佔統治地位的西方宇宙體系是第谷體系，但水晶球體系也曾經贏得一些朝

鮮學者的採納，其中最著名的是18世紀的實學家李瀼，他對天體系統結構表示出這樣的看法：“經星及七政之天重重包裹，如葫蒜之根，有內外之苞也。然精氣所成，明如玻璃之通望不礙。”⁽⁵¹⁾這種觀點明顯來自利瑪竇“此九層相包如蔥頭皮，皆硬堅。(……)天體明而無色，則能通透光，如琉璃水晶之類，無所礙也。”⁽⁵²⁾

漢譯西學書傳入後，在知識界引起震動。當時“名官儒生無所不聞，常時備置於書齋，視如諸子百家著作或道佛之書”⁽⁵³⁾。據載《職方外紀》傳入後，朝鮮學人爭相閱讀。南克寬在〈跋職方外紀〉中寫道：“艾儒略《職方外紀》云，大西洋極大無際涯，西國亦不曾知洋外有地，百餘年前，有大臣閣龍者，尋到東洋之地，又有墨瓦蘭者，復從東洋於中國大地，於是一周。”⁽⁵⁴⁾他在〈分野〉一文中又進一步指出：“今中國者不過大地中一片土。(……)大則九州亦一國，小則楚亦一國也，齊亦一國也。”即便是慎後聃，在讀過《職方外紀》後也在自著的《西學辨》中闡述了西洋地理知識，並且較詳細地評論了西洋的教育、學術、宗教等。的確，該書對朝鮮吸取新的世界知識起了重大作用。⁽⁵⁵⁾星湖學派的領袖李瀼正是在研讀了地理學漢文西書後，逐漸接受了地圓說等。他這樣描述地球：

地球上下有人之說，至西洋人始詳。金判書始振，深非其說。南斯文克寬著說辨之云：今有一卵，蟻從皮殼上週行不墜。人居地面，何以異是。余謂南之謂金，以非攻非也。蟻附於卵，能無墜者，以蟻足粘着也。今有蟲豸緣壁，失足便墜，何以曉人？曉人此宜以地心論，從一點地心，上下四方都湊向內。觀地球之大懸在中央，不少移動，可以推測也。卵在地球一面，卵亦離地便墜下矣，卵之下面，願何以附行耶？⁽⁵⁶⁾

正因為地球是圓形的，無所謂中心，因而中國也祇屬於世界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李瀼認為“貴夏賤夷，為無義也”⁽⁵⁷⁾，對傳統的“華夷觀”予以否定。他的這種見解也影響到他的學生安鼎福，他這樣批判“華夷觀”：“自古儒者，每嚴華夷之分，若不生於中土，則盡謂之夷，此不通之論，天意何嘗

有界限？”⁽⁵⁸⁾洪大容也是根據傳入的西方地理知識認識到：“且中國置於西洋經度之差至於一百八十，中國之人以中國為正界，以西洋為倒界；西洋之人，以西洋為正界，以中國為倒界。其實戴天履地，隨界皆然，無橫無倒，均是正界。”⁽⁵⁹⁾他據此否定了以中國為正界的傳統的中華中心觀，而提出“華夷一也”⁽⁶⁰⁾的主張。此外，漢譯西學書的傳入對朝鮮實學的產生亦極具意義，被稱為朝鮮實學產生的外部條件之一。姜萬吉說：“17世紀以來，在中國刊行的各種西學書籍傳入朝鮮，當時的智識分子爭相閱讀。這個時候傳入的西學書籍有數學、天文學、農業科學之類的科學技術系統的書籍，還有各種宣傳天主教教義的書籍，這一類成為一部分實學者研究學問的催化劑。”⁽⁶¹⁾從《職方外紀》傳入朝鮮後被大多實學先驅精心研讀這一事實來看，姜氏所言極是。

其次，西方器物的輸入，為朝鮮西學發展提供了實物參照。陸若漢贈與鄭門源的這門火砲，從鄭門源派別牌將鄭孝吉學習紅夷砲操作技術，使團並獲贈《紅夷砲題本》一冊推測，這門火砲應為紅夷砲。由於當時朝鮮正面臨後金勢力的威脅，仁祖大王李倧對其格外重視，鄭門源因“覓來西砲，志在禦敵，誠極可嘉，特加一資”⁽⁶²⁾。當承政院強烈反對嘉獎鄭門源時，李倧竭力辯護曰：“鄭門源覓來火器，制度精妙，我人學習，則必賴其力。數之多少，不足論也。海行艱苦，且有其功，一番酬慰，似無不可。”儘管承政院官員在半個月九度請仁祖大王收回成命，仁祖堅持未允。⁽⁶³⁾紅夷砲的傳入，無疑對提昇朝鮮軍隊的戰鬥力有一定的幫助。鄭門源輸入的還有西式日晷，“日晷一座，定時刻，定四方，定日月之行”。

望遠鏡是鄭門源首次從中國帶回朝鮮，同時帶去的還有兩部關於望遠鏡的中文著作和陽馬諾的《天問略》，它們的傳入，對朝鮮天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一些朝鮮智識分子正是借助它們獲得新的天文發現。例如，李瀼在其《星湖僿說》中這樣記道：

《天問略》云：所謂天河者，小星稠密，故其體光顯相連若白練。西國有望遠鏡，能察如此。(……)如金星大於月，日大於地，銀河為

星氣，金水二星有珥之類，非目力可得，此斷非鑿空，當從之。⁽⁶⁴⁾

根據這些新發現，李瀛糾正了朱熹等中國學者對月中暗影的錯誤解釋。朱熹曾經認為，這些暗影是大地山河在月亮上的影像，宋代以後的中國學者一般都讚同這種解釋，這種觀點也傳到了朝鮮，並得到天文學家們的引用。⁽⁶⁵⁾李瀛根據新傳入的西方天文學知識，對此提出了新的解釋，認為：“日月之大，亦必有文在其中。日自有光，雖有文不露，月借日光，有文則見也。”至於“月文”的成因，他的解釋是：“月形亦必與大地相侔。地之形，土高則為山，土深則為海。月亦有如此者，故其明處水氣之聚也，其中黑處土氣之聚也。及受日之光，水氣明而土氣暗也。”⁽⁶⁶⁾湯若望在《遠鏡說》中介紹望遠鏡天文新發現時曾提到：“如太陰，其形不圓，其面顯泡，其不滿之內邊高低不等。”李瀛的上述觀點明顯受到湯若望的影響，但是李瀛認為月免明處為水，暗處為土的觀點則不正確，與《遠鏡說》中關於太陰“本體有凸而明者，有凹而暗者，蓋如山之高處先得日光而明也”的說法完全相反。⁽⁶⁷⁾同時，望遠鏡的應用，對軍事技術的發展也極具意義。

總之，自陳奏使鄭門源始，赴京使臣與西方傳教士發生交往，附帶輸入西洋文物似成定規，赴京使臣因而被譽為“引入西洋文物的導管”⁽⁶⁸⁾。這不僅最終導致“朝鮮西學”思潮的出現，也成為催生朝鮮實學的重要因素。通過對赴京使臣輸入西學的研究，還有助於我們拓展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視閥。業師黃時鑒先生曾說：“從中西關係史的視角來考察中韓關係史，就很容易感知，中西關係史常常延伸到韓國（還延伸到日本），而韓國（還有日本）歷史上與西方的交往則又往往是以中國為媒介的。在古代，佛教從印度和西域傳到中國，而後再傳到朝鮮半島和日本，中韓、中日的佛教交流史乃是佛教入華史進一步向東的延伸。大航海以來，西學東漸，先到中國和日本，而朝鮮王朝時代的西學則首先是經中國傳過去的。韓國的西學初傳史也是西學入華史進一步向東的延伸。”⁽⁶⁹⁾——誠為的論。

【註】

- (1)(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32，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2)(3)(韓)李元淳著，王玉潔等譯，鄒振環校：《朝鮮西學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105；頁25。
- (4)《李朝太祖實錄》，元年十一月甲辰。
- (5)(8)(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三二〇，《外國一·朝鮮傳》。
- (6)葛振家：《論明代中國人的朝鮮觀》，《韓國學論文集》第4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
- (7)(韓)吳一煥：〈17世紀初明與朝鮮海路交通的啟用〉，《歷史教學》1996年第12期。
- (9)權近：〈奉使錄〉，《明代中韓關係史料選輯·朝天錄》，臺北：珪庭出版社1978年版。
- (10)楊昭全、何彤梅：《中國—朝鮮·韓國關係史》（下），頁53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 (11)(12)(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頁26，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13)蘇光震：《後泉遺稿》卷三，〈朝天日錄〉。轉引自(韓)吳一煥〈17世紀初明與朝鮮海路交通的啟用〉，《歷史教學》1996年第12期（8-11頁）。
- (14)《明神宗實錄》卷五八七。
- (15)《光海君日記》卷一六五，十三年五月癸卯。見吳吟：《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頁3124，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16)(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二五一。
- (17)(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三二〇，〈外國一·朝鮮傳〉。
- (18)張婷婷：〈明代朝鮮朝貢路線的演變〉，《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
- (19)鄭經世：《愚優先生文集》卷三，〈請復登州舊路奏文〉。轉引自(韓)吳一煥〈17世紀初明與朝鮮海路交通的啟用〉，《歷史教學》1996年第12期（8-11頁）。
- (20)洪風漢等編著：《（增補）文獻備考》卷一七七，〈交聘考七〉，韓國明文堂影印本，1985年。
- (21)《明熹宗實錄》卷十三，天啟元年八月癸巳。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1962年影印本。
- (22)鄭經世：《愚優先生文集》卷三，〈請復登州舊路奏文〉。
- (23)(明)徐光啟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上冊），頁289，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 (24)方豪：〈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國之史料〉，《東方雜誌》，第40卷第1期。
- (25)(明)徐光啟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上冊），頁175，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 (26)(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217，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27)《明熹宗實錄》卷六十八，天啟六年二月戊戌。
- (28)方豪：《中西交通史》（下），頁773，長沙：嶽麓書社，1987年。
- (29)方豪：〈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國之史料〉，《東方雜誌》第四十卷第1期。

- (30)《明熹宗實錄》卷七十，天啟六年四月辛卯。
- (31)《明熹宗實錄》卷七十九，天啟六年十二月庚申。
- (32)《崇禎長編》卷三十，崇禎三年正月甲申。
- (33)(明)徐光啟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上冊)，頁299，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 (34)林延清：《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頁9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
- (35)《李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二三，九年六月丙寅條。
- (36)(韓)李元淳著，王玉潔等譯，鄒振環校：《朝鮮西學史研究》，頁4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 (37)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頁40，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影印本。
- (38)《李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二三，九年六月丙寅條。
- (39)轉引自楊雨蕾〈西學初傳朝鮮——在華西方傳教士與朝鮮燕行使臣交往的歷史考察〉，黃愛平、黃興濤主編：《西學與清代文化》，頁214-223，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40)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頁41，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影印本。
- (41)關於此次鄭門源一行攜入的西洋文物，存有不同說法。朝鮮《東國寶鑑》卷35記載有：〈天文圖〉，〈南北極〉兩幅，〈天文廣教〉兩幅，〈萬國全圖〉五幅，〈紅夷砲題本〉，千里鏡一部，日晷觀一座，自鳴鐘一部，火砲一部和《治曆緣起》二冊，《利瑪竇天文書》一冊，《遠鏡書》一冊，《千里鏡說》一冊，《職方外紀》一冊，《西洋風俗記》一冊，西洋國所獻神威大鏡疏一冊等。見朝鮮《東國寶鑑》卷三五，轉引自(韓)李元淳《朝鮮西學史研究》，頁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韓國學者姜在彥的記載則有不同：「鄭門源回自京師，獻西洋人陸若漢所贈《治曆緣起》一冊、《天主略》一冊、《利瑪竇天文書》一冊、《千里鏡說》一冊、《職方外紀》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西洋國貢獻神威大鏡疏》一冊、《天文圖南北極》兩幅、《天文廣教》兩幅、《萬里全圖》五幅、《紅夷砲題本》一。」見(韓)姜在彥：《朝鮮西學史》，頁50，漢城：民音社，1990年。
- (42)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313，北京：中華書局，1946年。
- (43)李晔光：《芝峰類說》卷二。
- (44)韓國學者金良善認為《兩儀玄覽圖》是在1604年由赴京使臣黃東溟帶入朝鮮，見(韓)金良善〈明末清初耶穌會宣教師製作的世界地圖〉，《梅山國學散稿》，頁187，韓國崇田大學校博物館，1972年。轉引自楊雨蕾：〈利瑪竇世界地圖傳入韓國及其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5年第1輯。中國學者鄒振環亦持此說，不過傳入者為「黃允中」，當為「黃中允」之誤，見鄒振環：〈西方地理學的學術挑戰與中韓學人的應戰——明末清初地理學漢文西書的東傳及其在中韓文化史上的意義〉，《復旦學報》1999年第3期。
- (45)楊雨蕾：〈利瑪竇世界地圖傳入韓國及其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5年第1輯。
- (46)《李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二四，崇禎七年(仁祖九年)七月甲申。
- (47)青柳綱太郎著：《增補文獻備考》卷一七四，頁35，朝鮮研究會，1917年。
- (48)趙慶男：《亂中雜錄》，頁35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
- (49)李光濤：《明清檔案存真選輯三集》，頁151-157，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5年。
- (50)(韓)李元淳：《朝鮮西學史研究》，頁40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 (51)安鼎福：《星湖僊說類選·天地門》，轉引自石雲里：〈“西法”傳朝考〉(上)，《廣西民族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年第1期。
- (52)利瑪竇：《乾坤體義》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53)(朝)李熙弼著，(韓)金俊燁譯：《辟衛篇》，頁485，韓國：明文堂，1987年。
- (54)鄒振環：〈明清西方耶穌會士的地理學漢文西書與中韓學人的“世界意識”〉，《韓國研究論叢》第六輯，頁214-25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 (55)(韓)李元淳：《朝鮮西學史研究》，頁4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 (56)(朝)李灝：《星湖僊說類選》卷一下〈天地篇下〉地理門地球條。
- (57)(韓)李灝：〈答安百順問目〉，《星湖先生文集》，頁55，漢城：驪江出版社，1984年。
- (58)(韓)安鼎福：〈答上星湖先生書(戊寅)〉，《順庵集》，頁55，漢城：驪江出版社，1984年。
- (59)(60)(朝)洪大容：〈湛軒書〉，《醫山問答》，韓國良友堂，1988年，頁64，頁72。
- (61)(韓)姜萬吉：《韓國近代史》，頁158，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
- (62)吳哈：《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頁3478，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63)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承政院日記》，第33冊，頁548-552。
- (64)安鼎福：〈星湖僊說類選·天地門〉，轉引自石雲里：〈“西法”傳朝考〉(上)，《廣西民族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年第1期。
- (65)李純之：《諸家曆象集》卷一，漢城：誠信女子大學校，1983年。轉引自轉引自石雲里：〈“西法”傳朝考〉(上)，《廣西民族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年第1期。
- (66)安鼎福：〈星湖僊說類選·天地門〉，轉引自石雲里：〈“西法”傳朝考〉(上)，《廣西民族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年第1期。
- (67)湯若望：〈遠鏡說利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轉引自石雲里：〈“西法”傳朝考〉(上)，《廣西民族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年第1期。
- (68)(韓)李元淳著，王玉潔等譯，鄒振環校：《朝鮮西學史研究》，頁4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 (69)黃時鑒：《東西交流史論稿》序言，頁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